

邓小平和陈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交往

张金才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 北京 100009)

〔摘要〕 邓小平和陈云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即开始交往。他们的交往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时期,尤以长征路上和抗日战争时期较为集中。他们在交往过程中建立起的良好工作关系和个人关系,为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深度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关键词〕 邓小平;陈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交往

〔中图分类号〕 A8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921(2016)04-0118-08

DOI:10.16870/j.cnki.51-1763.2016.04.014

邓小平和陈云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即开始交往,尤以长征路上和抗日战争时期为较集中。他们在交往过程中建立起的良好工作关系和个人关系,为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中的深度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这一时期,邓小平和陈云的交往有三个重要节点,一是上海时期,二是苏区时期,三是长征路上特别是遵义会议前后。

1927年春邓小平从苏联回国后,在

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工作了仅3个月左右时间,即到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担任中共中央秘书。1927年“八七会议”后,为避开武汉险恶的局势和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于10月初秘密从武汉迁往上海。邓小平随中共中央机关一同迁往上海,年底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当时的中共中央秘书长,虽然只负责处理中共中央机关日常事务,列席中共中央各种会议并做记录,管理中共中央机关的文书、机要、交通、财务、各种会议安排等,“也为中央起草一些次要性质的文件(如对次要省区的指示)”^{〔1〕},但这一岗位却很重要,工作也很繁忙。

邓小平在上海党中央机关担任中共

〔收稿日期〕 2016-05-13

〔作者简介〕 张金才(1968),男,山东德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政治史研究室副主任,法学博士,主要从事邓小平和陈云思想生平研究。

中央秘书长的两年间，陈云也在上海领导农民运动工作，先是在上海外县参加领导小蒸、松泾农民武装暴动，后随中共淞浦特委迁入上海。这是他们首次同城工作。

陈云在参加领导小蒸、松泾农民武装暴动期间，曾多次去上海向江苏省委报告工作。中共淞浦特委机关迁往上海后，陈云也于1928年9月下旬随之迁到上海，开始了在上海秘密环境下的革命斗争。特委机关曾设在同孚路（今石门一路）与福煦路（今延安中路）附近的一家烟纸店楼上，距离中共中央的一处办公和活动地址同孚路柏德里700号很近。邓小平和陈云此时是否已有来往，笔者无法断言，但认为可能性不大。因为陈云主要是向江苏省委报告工作，与中共中央并无直接工作关系，况且当时秘密工作的环境也不便于人们往来。形势严峻时，中共中央各部门之间也不方便往来。当时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郑超麟后来回忆说：“那时白色恐怖很厉害，我们中央各部门就不来往了。我参加中央的几次会议，都是有人带我去的。邓小平和中央秘书处住的地方我从来没去过，并且也不许去。”^[2]

苏区岁月是邓小平和陈云的一段共同革命经历。邓小平于1931年8月进入中央苏区；陈云于1933年1月到达中央苏区。1934年10月，他们一起踏上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路。

在中央苏区时期，邓小平和陈云是否已相互认识，根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仍无法判定，但此时他们已知道对方的名字则是可以肯定的。陈云进入中央

苏区后，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继续担任全总党团书记。在1934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陈云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是知名度很高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因此，在中央苏区时期，邓小平应该已知道陈云的名字。他主编的《红星》报还于1934年5月20日第43期发表过陈云撰写的社论，严厉批评军委总供给部对工作不负责任的错误。^[3]在中央苏区反对以邓、毛、谢、古为代表的“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中，陈云作为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成员虽然没有参加这场运动，但他对所谓“毛派”头子的邓小平也应该是有所耳闻的。

“遵义会议”前后，邓小平和陈云的直接接触多了。长征开始后，邓小平带领《红星》报编辑部被编在第二野战纵队，该纵队也称红章纵队，由中共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和军委后勤部门、共青团等单位组成。此时，陈云随后卫部队行军。1934年12月18日黎平会议后，为适应机动作战的需要，中革军委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陈云任政治委员。12月21日，陈云到军委纵队就职。此后，邓小平与陈云有了直接接触的机会。刘英回忆说：“长征刚刚开始时，我和邓小平他们常常在一起。只要有半天休息，大家就常常凑在一起，没事干，就吹牛。大家开玩笑，成立了一个牛皮公司，陈云是总经理，邓小平是副总经理。没有吃的，就吹吃的，精神会餐。”^[4]这段话是邓小平和陈云在长征初期深度接触的生动写照。到遵义会议时，由于参加会议的

人员并不多,邓小平又担任会议记录,因此,他们在3天会议期间应该会有更多的接触与了解。

二、抗日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和陈云分处前线和后方,他们的接触限于邓小平三次到延安开会时,以及邓小平四次就太行区和华北地区经济情况致中共中央转西北财经办事处电,但此时他们的关系已十分密切。

1938年9月11日,邓小平到达延安,作为晋冀豫区代表和陈云一起参加了9月29日至11月6日召开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并分别作大会发言,就抗战15个月以来地区和部门工作进行总结。

邓小平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在10月6日的发言中,他联系129师坚持敌后抗战的经验和体会,就抗战新阶段的形势、华北抗战的任务、开展游击战争以及在统一战线内部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等问题作了阐述。邓小平指出:国民党投降妥协危险仍严重存在,虽然有所好转,但必须估计到两面性,必须准备万一。无论政治、思想与群众力量各方面均应注意,应估计到突变。事情应向着坏的方面想,提高自己警惕。在谈到华北问题时指出:现在主要任务是巩固。发展由上至下是可以的,但巩固必须由下至上,否则无法巩固。在谈到游击战争问题时指出:应从坚持华北抗战着眼来开展游击战。应以分支袭扰,结集主

力出击。补充主力部队的方式仍应依靠游击队,但不应一口吞完。枪支问题,应由平原回来部队来调剂。地方武装、政府武装与正规军要改善双方关系,要真打游击。地方部队应出动,正规军指挥他们必须经过合法手续。在谈到国民党问题时说:国民党的发展,主要是采取特务工作方式。利用新叛徒反共,我党应给予制裁。对国民党的斗争方针是在某种条件下,联合旧派^①来抵制。抵制方式主要用群众力量,教育群众来反对国民党。在谈到政权问题时说:应淘汰一部分坏分子,提高对政权工作的注意。一切政权的改革及参议会的建立,应完全把握在党手里,但不应排挤同情分子,应好好安置同情分子。在谈到军队问题时指出:学习晋冀察整军精神,要注意实质,应放下架子,先充实基干,然后缩制变小。军区的整理,应采取这样的方式充实主干,抽出一部分干部学习。部队补充应依靠军队本身的努力。军队应协助地方党工作,将军队与地方党的关系搞好。^[5]

10月29日,邓小平又在会上作《关于地方工作的报告》,介绍开创晋冀豫尤其是冀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初步经验,阐述敌后根据地的建党、建政、武装斗争等问题。这个报告使中共中央对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情况更加了解,对其发展更加关注。

陈云于10月31日在全会上作关于青年工作问题的报告。当时他兼任中共

^①旧派,又称“旧军”,指国民党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指挥的晋绥军。

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报告指出：取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政策是正确的，取得了成绩。以后青年工作不要只采用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这一个办法，而要采取各种方式。巩固与扩大统一青年组织的方针是争取把三民主义青年团作为全国青年合作的机关，但在实现之前，还需要吸引青年参加其他组织，以求走向统一。战区青年运动要来一个大转变，由学生运动转变为工农青年运动。在云贵川桂大后方，要先采取公开合法的方式进行学生工作，如通过基督教青年会、办合作社等等，使其慢慢转到工农青年工作。党领导的青年工作要有统一的组织，但具体形式上可采用联合办事处形式，作用是总结和交换工作经验，发展组织联系。青委工作可以相对独立，但它仍是党委的一个部门，不要成为第二党。党组织在调动干部时要照顾青委干部的稳定性，勿使其流动太大。青年干部的团结对团结全国各党各派的青年有很大作用。青年人的好处是勇敢做事，有话就说，但也有弱点，就是好胜心很大。说话要谨慎，不要刺激。爽直是好的，但忍耐性不够也是不好的。要以冷静客观的态度来看问题。气量要大些。去小异而求大同。

陈云在报告中还就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工作，谈了加强党内团结，掌握用人之道问题。他指出：国际指示对我们今后工作有很大帮助。自1935年遵义会议到现在，中央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这主要是因为中央集体有政治远见，起了把舵作用，不会被某些现象所蒙蔽，能看到现实的本质。同时，不停留在事件

本身，能看到它运动的将来。有了远见，才能对事件的认识更加尖锐。远见就是马列主义。党内团结很重要。要想达到思想上的团结，党内的同志，特别是比较高级机关的同志，看问题的方法要差不多。在领导机关的工作中要互相尊重，要虚心。掌握用人之道，主要是方法问题。第一，要全面认识人。每个人的短处中也有长处。能够看到短中有长，长中有短，则每个人都可用。不要只看一件事情，一个时候，要上下左右看。看人要大公无私，能提意见的干部是好的，不提意见的不见得是好的。第二，用人要气魄大。用干部要实现六个字，即要使人“敢说话、敢做事”。如何使人敢说话？主要是态度问题；少戴高帽子，不要什么都提到原则的高度；对新党员批评要恰当，要使他们有接受的基础。如何才能使人敢做事？上级领导干部，常常因为责任心的关系，对下级抠得太紧，结果下级的自动性、积极性都培养不出来；应该告诉做工作的同志：错误是免不了的，成绩一时不会很大，不要怕犯错误，要大胆去做工作；领导不要什么事都去过问。第三，爱护干部。不要拿干部打桩子和抬轿子。要解决干部的日常问题，使干部安心。对干部要负责，不能提上来又打下去。培养干部要十多年，但损失干部只有几句话就可以。教育干部需要耐心。要使干部觉悟有转弯的余地，对犯错误的同志，应该继续使用，将功补过。第四，做模范问题。每个同志应当做遵守纪律的模范，对遵守纪律的要奖励。^[6]

邓小平这次到延安参加中共扩大的

六届六中全会时,知道了陈云和于若木结婚的事情后,马上就作了一首打油诗:“千里姻缘一线牵,鼻痛带来美姻缘。中山政策女秘书,先生路线看护员。”^[7]意思是说孙中山跟宋庆龄的结合缘于宋庆龄担任孙中山的秘书,而于若木为陈云作鼻痛护理也促成了陈云和于若木的美好姻缘。这首诗非常形象地概括了陈云和于若木相识相恋的经过,也反映了邓小平和陈云关系的密切。

1939年4月29日,邓小平第二次到延安,和陈云一道参加了7月3日至8月2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等待开会的两个月时间里,邓小平接触了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和来自各个根据地的负责人,参加了一些会议和活动。会议期间,7月7日,邓小平在延安各界举行的抗战两周年并公祭抗战阵亡将士纪念大会上代表八路军前方将士发表讲演。讲演中说:八路军两年战斗不下数千次,千万民族战士,为祖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八路军在华北牵制住敌人九个师团,连伙夫都深明抗战大义,所以八路军是坚决抗战的。有些顽固分子造谣中伤,说八路军“游而不击”,或“不游不击”,已完全为事实所揭穿。八路军抗战两年以来,收复了广大失地,死伤达十万以上。投降派反共分子的毁伤,并不能丝毫有损于八路军,只显得他们的无稽而已。八路军一定要把日寇驱逐出去,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8]

7月16日,为纪念抗战两周年,邓小平在7月7日演讲稿的基础上写成《八路军坚持华北抗战》一文。文章指出:谁都知道八路军的武器是最坏的,生活是

最穷困的,但它却能与装备最现代的日寇进行顽强的斗争,并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钳制了敌人的九个师团,即占全国寇兵的四分之一的兵力,给予日寇以严重的打击与消耗。它配合了华北友军,协助了当地政府,动员与组织了广大的华北人民,从日寇、汉奸手上夺回广大的国土,创立了许多块的抗日根据地。它在最困难的环境中,为了保卫我们的国土,没有一天不在与敌人战斗。它不断地打破敌人对于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并坚持着广大平原的游击战争;它始终至诚地执行着三民主义和统一团结的方针,实行了一些进步的措施,启发了民众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依靠着这些,给了华北抗战以新的生命。因此,活跃的华北战线,给了全国各个战线以很大的助力,特别是在保卫西北的任务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此抗战两周年纪念之际,八路军和华北人民献给全国同胞的,不但是它的光荣战绩,更主要的,还是它的一颗赤诚为国的心。华北的斗争日愈严重着,它将一如过去两年,准备在任何困难环境中,为保卫华北,保卫中国而奋斗。^[9]

陈云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针对汪精卫的投降活动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使国内团结抗战局面出现的严重危机,陈云在7月3日的发言中说:反共就是投降的准备,有人对这一点还不了解。要用事实说明国民党投降的危险,以教育群众。在8月23日的发言中说:现在日本的基本方针是要实行政治诱降,反共危险与投降危险是不可分的。我党在政治上必须对国民党施加压力,在党

内外提出反对投降危险是动员群众所必需的。发言还对自首分子、党员年龄、党费、其他党派加入中共等问题提出了意见。^[10]

会议期间,陈云还于7月8日撰写了晋冀豫工作之意见,对邓小平所在的晋冀豫地区中共组织工作进行指导。意见指出:晋冀豫党的工作取得很大成绩,有强大的党组织,培养了大批干部,积累了许多经验教训;帮助了军队扩大,组织了地方的队伍;开始有计划地组织群众;现正在打击敌人的进攻。晋冀豫是华北抗战的基点,也是保障黄河、联系黄河南岸的基点,是我们的必争之地。晋冀豫地区情况复杂,必须正确把握统一战线原则,广泛开展群运工作。党的工作及其指导,要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有不同的任务和步骤。党的活动要深入到村,每个区先抓好一个地方,树立模范。要改变组织机构层次过多的情况,多提拔本地干部,多发展女党员。^[11]

1944年11月至12月间,邓小平就太行区和华北地区经济情况四次致电中共中央转西北财经办事处。而此时正是陈云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

11月1日,邓小平和滕代远、杨立三致电中共中央转西北财经办事处,报告太行区的经济情况:太行区近半月来内地情况无甚变化,除山货外,一般物价均看下落,尤其是粮食。敌人加紧掠夺物资,首先是棉花,其次是粮食等,对我山货统制相当严格,采取低价吸收。因为伪钞跌价,一般商人存货不存款,有货不出手,敌人也无可奈何。还报告:天津物价继续上涨,伪币充斥市场,敌人

强行抑制物价,结果更促进商人囤积居奇,形成有行无市的局面。

11月15日,邓小平和滕代远、杨立三致电中共中央转西北财经办事处,通报11月上旬华北地区经济情况:最近敌人积极紧缩通货,效果很小,只有粮价稍落,伪钞依然不振。由于通货膨胀,物价飞腾,所以敌人在采取紧缩政策同时,又要强收物资,在银根吃紧的条件下,不但伪钞不能提高,更迫使囤积居奇,黑市流行。天津有些货不涨也不落,并无成交,有行无市。内地外汇因敌人紧缩,稍感缺乏,土布、食盐、棉花上涨,山货依然上涨。25日,邓小平和滕代远、杨立三致电中共中央转西北财经办事处,再报华北地区经济情况。^[12]

12月26日,邓小平致电中共中央并转西北财经办事处,报告12月上半月太行经济状况:敌对我山货掠夺的办法,是经过各种收买,并加公开掠夺,对我山货价格加以限制。敌人的货币政策,一面是紧缩通货,一面又发行大票,市上流行很多,黑市更加厉害。太行内地粮价普遍下跌。由于山货待价不出,因此内地很便宜,盐价稳定。^[13]这些电文对陈云了解太行区和华北地区经济情况,进而更好地领导边区财经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召开的中共七大上,邓小平和陈云一同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7月,邓小平第三次到达延安,作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和陈云一起参加了8月9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会议着重讨论时局问题,通过根据六届七中全会和七

大代表意见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陈云在发言中指出：罗章龙组织非常委员会、第二省委和区委，是不允许的，是反党的，这一点应当说清楚。当时有人反对六届四中全会，但未参加反党组织，有的参加了又出来，这也必须说清楚。^[14]

此次回延安，邓小平还于8月23日和陈云一起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分析抗战胜利后的国内外形势，讨论党在新形势下应采取的方针和对策。陈云在发言中指出：现在打大城市不合算了，应搞乡村，搞小城市。大城市没有进去，有主客观的原因。新的口号应该是争取和平。可能有些人因没进大城市而不太高兴。只要我们是团结的，就是任何力量都不能打垮的。准备持久这一条很重要，要准备最坏的可能性，但不放弃争取好的局面。要指示各地把小城市的机器好好保留起来，做经济上的准备。^[15]会后，邓小平飞返太行前线，陈云奔赴东北战场。

三、解放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和陈云分属不同战场，由于战事紧张，因而交往较少。为数不多的几次交往发生在解放战争胜利和新中国成立前夕。

1949年7月14日，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从上海到达北平，向中共中央领导人汇报华东局工作及大军渡江与接收南京、上海、杭州情

况。邓小平说明上海情况严重：“煤粮两荒。接收旧人员十五万，工厂原料缺，运输贵，开厂难，学校多，税收少，开支大，被迫大发行。农村全部以物易物，或光洋市场。”邓小平与两月前已从东北来北平主持中央财经工作的陈云面谈上海情况，“提出厂校及人员疏散，向各解放区求援”^[16]。中共中央政治局十分重视邓小平的报告，决定委托陈云去上海主持召开各解放区财经会议。7月16日，陈云致电东北局财委李富春、叶季壮，转报邓小平所谈上海情况，请叶季壮离开沈阳赴上海参加财经会议前，研究东北可否挤出15万至20万吨带壳粮支援上海，并准备从上海迁一部分工厂学校到东北。

陈云到上海后，经过调查研究并综合与会者意见，改变了原有设想，决定立足于恢复与发展生产来解决问题。他说：“这件事情要慎重。应将解决目前困难与全国长期建设看成两回事，分开来处理。不能因为目前有困难，就把许多工厂搬走了事。要完全具备搬厂的经济条件并不容易。例如，从原料的供应来说，纺织厂可以搬到棉花产地，但工厂生产需要有适当的厂房，还需要有电力、机械等有关的企业与之相配合，这些条件棉花产地就不一定具备。估计上海工业的主要部分不能搬，目前应力争维持生产。”^[17]

邓小平与陈云在这时期的第二次交往是共同参加新中国的开国大典。1949年9月30日下午3时，邓小平和陈云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最后一次会

议。在会上，他们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10月1日下午2时，邓小平和陈云出席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政府施政方针。下午3时，邓小平和陈云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毛泽东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邓小平和陈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共同见证了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这是他们参加革命20多年来一直为之奋斗的崇高目标和伟大理想。如今这个目标和理想终于在他们盛年的时候变成了现实。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和陈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及改革开放中，又开始了并肩战斗的新征程。

参考文献：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传

(1904—1974)：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91，96.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陈云传（一）[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155.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画传：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86—87.

〔5〕〔8〕〔12〕〔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231—232，256—257，541—542，545.

〔6〕〔11〕〔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陈云文集：第1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84—91，196—202，688.

〔7〕陈云纪念馆. 于若木画传[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40.

〔9〕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1卷[M].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03—104.

〔10〕〔14〕〔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陈云年谱（修订本）：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298，486，488—489.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陈云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

（责任编辑 王丽娟）

声明：本刊已先后被《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及CNKI系列数据库、《龙源期刊网》、《超星期刊域出版平台》收录并同时进行数字发行，本刊支付的稿酬已包括此项授权的收入。作者如无特殊声明，即视作同意授予我刊及我刊合作网站信息网络传播权；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刊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